



蜀汉佛教流传考

屈大成

(香港城市大学 中国文化中心,中国 香港)

摘要 蜀汉时代佛教流传的状况,由于文献不足,一向所知不多,也为佛教史著所忽略。可是,蜀地近年出土了各种带佛教元素的文物,显示当地的佛教已发展至一定程度。搜寻相关的文献记载,以及列举这些佛教文物,并对佛教在蜀汉的流传形态以及周边问题做出一些推测,以补空白。

关键词 蜀汉 佛教造像 崖墓 神树

中图分类号 B949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000-6176(2010)04-0017-04

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,至东汉末,安世高、支谶等西域佛教徒来华,佛教开始广泛流布,南方笮融更建浮屠祠,出现佛教组织。至三国时代,佛教在曹魏和孙吴都有不同程度地发展,至于佛教在蜀汉(221-263)的流传,文献的直接记载极少,反而相关的出土文物颇为丰富,形成强烈地对比,显示出蜀汉佛教的独特性,值得探究。以下分文献和出土文物两方面论述,最后做一总结。

一、文献记载

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记汉武帝建元三年(前138),张骞首次出使西域,在大夏见到由身毒运来、原产于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,并听闻一些身毒的情况,虽然他回国后向汉武帝的报告,没提及佛教,但已见蜀地跟身毒已有交流。常璩(约291-约361)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记永平十二年(69),哀牢夷人首领抑狼派遣他的儿子给朝廷上贡,明帝于是设置永昌郡,委派蜀

郡人郑纯担任太守,居住的夷人便有来自身毒者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1世纪末、2世纪初,掸国(今缅甸东北掸邦)多次朝贡,中缅关系良好,则由蜀地经缅甸至印度之路,有可能开通。《三国志注》引《诸葛亮集》记建兴五年(227)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,驻节沔阳(治所在今陕西勉县),“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、康居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余人”,到沔阳接受诸葛亮的指挥。“凉州诸国王”即西域长史统领下的西域诸国王,月氏、康居胡侯当指月氏、康居胡人侨居葱岭以东诸国而受封为侯者。^{[1](P26)}因此,蜀汉人跟西域胡人中的佛教徒,或有过接触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记蜀汉末永昌(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)太守霍戈“甚善参毗之礼”。“毗”或是荼毗的简称。荼毗,音译辞,火葬的意思,乃印度处理尸体的方法。故参毗之礼极可能是佛教丧葬之礼。^{[2](P73)}同书记晋泰始十年(274),汶山白马胡族抢掠其他民族,刺史皇甫晏上表请求出兵

收稿日期:2010-10-20

作者简介:屈大成(1966-) 广东省番禺人,哲学博士,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史、戒律学。



征讨。胡人康水子烧香断吉凶,预言作战必会失败,皇甫晏以为妖言惑众,把他处决。胡人烧香可能是佛教习俗,这时距蜀汉灭亡仅10年。此外,云南昭通市后海子中寨发现东晋霍承嗣壁画墓,建于东晋太元11至19年(386-394)之间。霍承嗣为霍戈后人。墓室北壁绘墓主和家人,另有“魂来归墓”等题字,东西两壁绘持幡队列、骑马队列等,有人估计是超度祭祀场面的描绘,或即是“参毗”之礼。

至于佛教方面的记载,僧佑(445-518)《出三藏记集》记有《蜀普耀经》和《蜀普楞严经》,细注说:“《旧录》所载,似蜀土所出”,语气不大肯定。慧皎(497-554)《高僧传·诵经篇》记有蜀郡郫人释僧生,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,没提到具体年代。《法苑珠林·敬法篇》引述相类似的记载,标明是西晋僧。如是,僧生是名字可考的首位蜀僧,而非一般以为4世纪中的法和。^{[3](P162)}其后义净(635-713)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记东印度有一旧寺号支那,仅余下砖基,相传是旧日室利笈多王为支那国僧所造。是时有唐僧二十许人,从蜀川牂牁道走来,向莫诃菩提礼拜。王十分敬重,遂布施这地建寺。估计支那寺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。按室利笈多王于3世纪末当权,中国僧人结队经蜀地西行也当在这年代。如是,西晋蜀地已有汉僧活动,则蜀汉时有汉僧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

二、出土佛教图像

相比于甚少的文献记载,蜀地自东汉末叶至三国时期,发现颇多佛教图像,显示出蜀地佛教流传的另一面貌。这些佛教图像,部分有确切纪年,其它大多属东汉末至三国时期,可分佛像、人像、其它三方面。佛像方面又可分三类:

1.崖墓佛像。崖墓,乃依山开凿的横穴墓;经墓门走过墓道后,进入前堂,空间宽敞,相当于祭奠用的墓祠,其后壁开凿一条或几条甬道,通向一个或几个墓室。崖墓佛像有以下四例:(1)四川乐山柿子湾区1号崖墓,其前堂

后壁的中部和左边开凿两墓道,两墓道门的两旁雕刻门卒和镇墓神,两门上正中均刻佛像,风化颇严重。(2)四川乐山麻濠区1号崖墓,其前堂左中右三墓道门上方正中分别刻有朱雀、佛、饕餮。这佛像头后有圆轮,高髻,穿通肩衣,右手开掌向外,舒五指,上举至近肩处,似作施无畏印,左手握衣角,盘腿而坐。这造型跟印度键陀罗、马土腊的早期佛像接近。(3)四川乐山虎头山3号崖墓墓门佛像,形像跟麻濠崖墓佛像相似。^{[4](P1)}(4)四川彭山652号东汉崖墓门柱内侧刻有带项光的佛像两尊,墓壁刻有高24厘米高的小佛像81尊。^{[5](P2)}还要注意的,四川平武县赖子湾大墓门柱上有题刻:“炳忠光远兴佛”、“……三人合,名炳忠、光远,二老一少”,字径近10厘米,隶体带篆意。“兴佛”可能是建墓者的目的之一。^{[6](P70)}

2.神树佛像。神树是西南墓葬独特的随葬物。树分树座和枝干两部分,前者为陶质或石质,后者为青铜铸造,当中塑造西王母、力士、羽人、方士、朱雀、熊、龙、马、凤鸟等各种神灵神兽,以及璧、方孔圆钱等形象。神树始见于东汉初,由东汉中期至蜀汉,约有22株、塑佛像69尊,不能尽录。最惹人注目的是重庆丰都县东汉延光四年(125)砖室墓出土的神树佛像,高髻,有横椭圆形项光,上唇有向上弯曲的口髭,圆领,袒右肩,右手作施无畏印。属蜀汉的如:(1)四川梓潼县砖室墓出土的神树坐佛,右手握左手贴于胸前,左右分别有人像马像,或是表现悉达多出家和成道的经变故事。(2)重庆市忠县涂井崖墓神树佛像9尊,高髻,上唇两侧有较直的口髭,圆领下垂,右手施无畏印,左手握衣角。(3)四川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陶座,座上塑三尊像,中坐者右手作施无畏印,结跏趺坐,当为佛,两旁有侍立像,左侍像着长裤,上身似穿一件大块上衣,右侍像着衣裤,右手屈向上,左手似置腰间。座下有龙虎争壁造



型。这两侍者曾有人以为是大势至和观世音两菩萨,现多数人以为是僧人或供养人。其它还有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、绵阳双碑白虎嘴崖墓、陕西汉中崖墓、四川安县崖墓和陕西城固县砖室墓出土的神树,都塑有佛像。

3.单尊佛像。云南昭通东汉晚年墓出土灰陶佛像,头顶有槌状物,螺发,圆脸,眼微合,高鼻,穿通肩大衣,右手施无畏印,左手握衣角,无项光和胡须。

人像方面包括以下三类:

1.结跏趺坐像。云南大理东汉熹平年间(172-178)砖室墓出土吹笛陶俑7件,深目高鼻,戴尖顶帽,似脚心向上盘坐。四川资阳、奉节、彭山、重庆北郊等也发现类近的吹笛俑。^{[7](P52)}

2.具白毫相像。年代最早的是四川芦山县发现的西汉青铜人像,“头似锥髻,前额正中有一瘤状凸起……目呈斜菱形,高鼻”。重庆市忠县涂井崖墓出土舞蹈、抚琴、听琴、击鼓、执镜等陶俑,部分额中有圆形凸出物,有的头部装饰莲花。

3.胡人歌舞像。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晚期崖墓发现胡人歌舞雕像壁画,或属“湟中月氏胡”,即被汉、羌同化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的小月氏。这可为佛教传入川渝各地的时间提供旁证。

其它跟佛教有关联的文物还有以下五件:

(1)四川什坊县皂角乡白果村东汉墓出土画像砖,刻三佛塔,平列,有莲柱相隔,居中一座线条较清楚,有四层重楼,上置三级塔刹,塔角尖直,也可能是类似浮屠祠中重楼的形象。^{[8](P2)}

(2)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出土陶屋模型,仿照实际建筑,有屋顶、天窗、檐额、瓦当、头拱、柱、栏板、门、窗等结构,中有胡人吹箫的形象,屋、栏板上角皆饰莲花。排列的形态跟谷仓罐的有点相近。另墓葬出土具白毫相各式胡人像。陶屋加上陶俑,放在墓中,似进行某种宗教仪式。构成“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,而为死者祈祷

冥福。”^{[9](P43)}

(3)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墓东汉晚期出土所谓三段式神兽镜,下段中央有神树,左侧一羽人左手放膝上,右手舒掌向上,似施无畏印。

(4)四川凉山西昌近郊发现莲荷图像青砖、莲花凤鸟花纹砖、莲花图案长方形砖。

(5)四川西昌邛海边的东汉砖石墓中发现朱砂书写的梵文符号。

此外,曹学佺(1574-1647)《蜀中名胜记》以及明清时代的地方史志,追记在蜀汉及其前已建有不少寺院,但遗迹都已灰飞烟灭,不可查考,很可能是托古之言,可信性不高,故不详列。^{[10](P23)}

三、结论

从上文的论述,可见蜀汉的佛教活动颇为兴盛,但文献记载极少,出土墓葬物又欠缺文字解说,因此围绕着出土文物发生的事情,以及它们的象征意义,仍停留在推测阶段。以下是关于蜀汉佛教流传的观察,期望有助补充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:

1.文献记载身毒等胡人早跟蜀地有交往,不能排除当中有佛教徒。从出土文物看,东汉中期蜀地已见佛教的痕迹,可推想至蜀汉时代,佛教应有相当发展。佛教文物中结跏趺坐、具白毫相等的胡人像,或是侨居蜀地的佛教徒的反映。而从崖墓佛像、神树佛像、陶屋模型等出土文物推测,这些胡人佛教徒或有参与丧葬等民间信仰仪式者。

2.崖墓室雕刻有各种神仙祥瑞,充当守护者,神树上各种塑像,包含丰收、财富、生殖、吉祥、长生、升仙等象征意义,佛像参杂其中,作为墓室或明器上的装饰,而非独立的造像。由是可推想到在蜀人心目中,佛像只是众多祥瑞之一,仿似东汉人般以佛教为方术一种。因此,他们对佛教的了解程度,很值得商榷。

3.蜀地有关佛教的出土文物甚多,文献记载却极少,形成强烈反差。有学者指出发现佛教文



物的崖墓多为四川先秦土著民族后裔所建,仍保留了浓厚的旧民族传统,重神异巫术,因此把佛像纳入其神仙系统,并置于墓葬内。^{[11][P129]}如是蜀地的佛教信仰或只局限于某部分社群,故主流文献不见载,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还要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霍戈,为蜀地高级官员,他曾举行佛教仪式,可见佛教已有打进上层社会的机缘。

4. 僧传记中书著作郎王度曾向后赵石虎(295-349)上奏,说汉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,汉人不得出家,魏亦承袭汉制。但蜀汉相信已有汉僧活动,可见蜀地远离中原,不受禁令的约束。

5. 由于蜀地出土东汉中期带佛教图像的墓葬物,反而中原一带没有发现,因此引出蜀地佛教来源的问题。不少学者推测是经蜀身毒道,即从印度出缅甸,由云南入四川,而非由西域或中原传入。可是,历来云南极少出土早期佛教造像,令这说法缺乏实物证据。有学者指出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或是跳跃式,故于蜀身毒道首尾两端的遗迹较显著,途中的则不多见,这跟西域于两汉时只是佛教由印度输入中原的通道,故不见佛教遗迹,情况不谋而合。此外,云南出土的汉末佛教遗物越来越多(例如昭通佛像、吹笛俑),可推想到这传入路线的问题在不久将来会有突破性的出土。

6. 僧佑和慧皎为南朝僧,他们的著述《出三藏记集》和《高僧传》不免详南略北。中国佛教史名家汤用彤指出,三国时佛教的重镇,“北为

洛阳,南为建业”,无言及蜀地,任继愈先生主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虽有提及,仍无辟专节讨论。但从本文可见,蜀地出土许多墓葬佛教图像,显示佛教在当地民间十分兴盛,日后的佛教史著,必须补上蜀汉这一笔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马雍.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[J]. 新疆大学学报, 1984(2).
- [2] 王海涛. 云南佛教史 [M]. 昆明: 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01.
- [3] 杨耀坤.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 [M]. 成都: 成都出版社, 1994.
- [4] 高文. 中国画像石全集 [M]. 济南: 山东美术出版社, 2000.
- [5] 刘长久. 中国西南石窟艺术 [M].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1998.
- [6] 向玉成, 萧萍. 乐山崖墓研究综述 [J].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, 2001(1).
- [7] 阮荣春. 佛教南传之道 [M]. 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0.
- [8] 谢志成. 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 [J]. 四川文物, 1987(4).
- [9] 吴焯.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 [J]. 文物, 1992(11).
- [10] 张弓. 汉唐佛寺文化史 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7.
- [11] 向玉成. 乐山崖墓佛像与佛教传入问题 [J].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, 2004(3).